

蘇俄、第三國際與孫中山——

「孫越宣言」的形成探討

壹、前言

謝易達

對蘇俄和第三國際而言，喚起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毀滅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步，但由於落後地區缺乏相關的工業條件，因而扮演此項運動的主要份子將不會是無產階級。列寧相信，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在亞洲的出現必可減弱西方強權領導階層的實力，因而加速社會主義者的革命事業。

（註一）

列寧指出：「剝削國家和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已經有了相當密切的關係，而且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往往在大多數的場合下；雖然也支持了民族解放運動，但同時又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作出妥協。」（註二）由於對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不信任，列寧要求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和其交往或組成臨時聯盟時，要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如此才能確保一切革命運動和階級鬥爭成果的最終勝利。

第三國際和蘇俄使團在和國民黨的交往上，便是根據列寧上述的觀點來進行，雖然早期他們認為陳炯明和吳佩孚才是代表中國民主資產階級者，而對孫中山本人並未重視，不過隨著中國情勢的轉變，第三國際對孫中山南方勢力的重視程度日增。在和國民黨的交往上其目的乃在：1. 使國民黨與蘇俄密切合作，來反對帝國主義，以進行所謂「世界革命」；2. 使中共黨員以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國民黨以影響其政策，其目的乃在於取代國民革命領導權；3. 促成國民黨注重農民及工人運動，以便使中共人員能在

國民黨的旗號下，發展共黨的勢力。（註三）事實上，第三國際在對國民黨的交往上有其一套整體策略，和莫斯科政府的外交手法相輔相成，透過正式的外交管道和革命勢力的交往，謀求中國政策的最大成效。

貳、早期的聯繫——互探虛實，充滿期待

俄國革命黨人和中山先生的接觸頗早，當中山先生早期在海外為中國革命事業奔波之際便會有機會在英、日兩地就彼此中俄革命的前景交換過意見。（註四）爾後，辛亥革命一役成功之時，列寧曾給予高度的評價，因為它「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使歐美的資產階級統治遭到破壞」。（註五）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發生之前，列寧就對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深感興趣和重視。並且多次為文論述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民族主義的影響，農民的條件；以及「跳越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直接自封建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註六）此一思維或多或少對列寧心中的中國政策的形成與推動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一九一二年七月，列寧發表了「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針對中山先生所著的「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提出了呼應。列寧表達了對中山先生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盛讚。卻對中山先生的社會主義策略表示了質疑，並指其帶有反動性，此外亦批判了中山先生土地綱領實行的可能性。唯對中國無產階級勢將形成「中國社會民主工黨」抱持著極大的期待。爾後，並針對新生的中國在亞洲的地位發表了多篇的文章，充分寄情於亞洲的覺醒能對「落後」的歐洲資產階級產生致命的打擊。（註七）同時，中山先生也十分關切俄國革命對亞洲以及世界的衝擊。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中山先生和列寧有了書信的往來。（註八）一九一八年六月底，中山先生曾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表達其祝賀之意。對此一新生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存在；此一世界無產階級政權在東方的地位及意義加以肯定。並呼籲中俄間持久

和平的交往，以及互惠合作的心願。

列寧收到來自中山先生的賀電後極為重視。透過時任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齊采林（G.V. Chicherin）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的覆函中表示了致謝之意。並重申了和平法案的精神，且批判了帝國主義的軍事干涉阻礙了與中山先生的聯繫，還呼籲中國工農同其奮鬥，為無產階級的共同利益更加團結。（註九）同年九月六日，莫斯科當局策動旅俄華僑，通過決議邀請中山先生訪俄。並由「旅俄華工聯合會」主席劉紹周出面致電中山先生，要求促成中國政府對蘇俄的外交承認。（註一〇）因此，列寧對孫中山的重視及拉攏乃在於利用其聲望來打擊北京政府，作為其和北京政府外交談判上的籌碼，同時亦對中山先生的南方政府抱有希望，希望將其導引到第三國際的立場來，（註一一）以進行其「兩面手法」的中國政策。基此，齊采林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再度致函中山先生，宣稱帝國主義的瓦解指日可待，彼此間應立即恢復貿易通商。（註一二）但由於信件送達之延誤，中山先生方於次年八月才覆函齊采林，表示廣州南方政府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北京政府實際上只是東京當局的工具，唯有南方國民黨政府取代北京政府時，雙方才可能恢復友好關係。現在因地理條件的阻隔，還不可能和蘇俄發生有效的商業關係，所以莫斯科應當等待，（註一三）但殷切的希望同齊采林以及莫斯科方面其它友人保持私人的接觸。並對俄國，蘇維埃的組織，軍隊和教育體制有興趣；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中山先生希望像莫斯科一樣，在青年學子中深深的打下中華民國的基礎。

當時，中山先生的南方政府因受軍閥的制掣而成效不彰，對於後中國革命成功的俄國能有此成效而深感興趣。甚至興起派人赴俄學習的念頭，（註一四）唯對於俄國所採行的共產主義不表信心，並認為國情的不同，俄國推行的無論什麼制度都不一定能有效地適用於中國。所以所有涉及意識形態的政治事物並不是中山先生的最先優先。（註一五）真正吸引中山先生的是共產黨的組織、技術、訓練計劃和有關的策略。而蘇俄和第三國際亦深知中山先生疑慮之所在；對於隱藏馬克思階級鬥爭的觀點，以及明確

表示無意將共產主義思潮導入中國的戰略退卻，都是使中山先生同蘇俄建立深層交往的必要手段。

參、交往的過程——各有利益，戒急用忍

列寧在和中山先生書信往訪的過程中，亦利用第三國際代表前往中國籌建支部之際，與中山先生的南方勢力有了聯繫。維經斯基是第一個見到孫中山的第三國際成員，他於一九二〇年秋在陳獨秀的建議下於上海會見了中山先生。中山先生首先詢問了有關蘇維埃俄國革命和俄國的情況，並向維經斯基詳細介紹中國辛亥革命的情形。晤談中，中山先生對於如何使南方的革命軍和蘇俄取得聯繫頗為關心，並表示因地因素阻隔了雙方的直接交流，但對於是否可能在海參威或滿州建立大功率的無線電台與廣州聯絡表示了興趣。（註一六）但此次的會面，並未使得第三國際和孫中山建立較密切的關係，因為維經斯基此次來華的任務是多元的，其重心完全擺在第三國際中國支部之建立和同吳佩孚、陳炯明的交往上。

第二個會見中山先生的第三國際代表是馬林，馬林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在張太雷的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經長沙赴桂林與中山先生有了接觸。馬林除了向中山先生本人及其領導的軍官們作了有關俄國革命的報告外，還討論了有關群眾運動和工人宣傳的重要性。並三度與中山先生長談「關於蘇俄承認他及與之結成臨時聯盟的可能性問題」。（註一七）馬林認為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雖以中國傳統道統思想為本；但其領導的國民黨仍具有社會主義的傾向。所以在以中國國民黨和蘇俄聯合為前提的見解下向孫建議：(1)改組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工農大眾；(2)創辦軍官學校，為建立革命武裝的基礎；(3)和中國共產黨合作。（註一八）

透過此次的會談，馬林使中山先生相信共產主義在蘇俄已經失敗，而其施行的新經濟政策和他的實業計劃相差無幾。（註一九）並認為馬克思主義並無特別之處，馬克思的相關理論亦可在中國的典籍中發現。最重要的是，此時中山先生雖然渴望取得俄援，但仍沒有放棄從西方獲得奧援的希望。而僅同意

和蘇俄作道義上的聯絡，對彼此建立公開的聯盟還有顧慮。此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現今地位，以及同國民黨的互動關係仍存在疑慮。但馬林則認為中山先生不僅是一個純粹的民族資產家，還同時擁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傾向。他所領導的國民黨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多階級聯盟」，而吳佩孚只是帝國主義扶植的代理人，中國革命決不可期望於他。（註二〇）

馬林對孫中山雖然有所不滿及懷疑，對國民黨的組織及宣傳亦感到失望。但馬林深信孫中山絕對比吳佩孚和陳炯明更具備攻擊資本主義的能力，（註二一）而中山先生在海員中的聲望以及工人階層中的領導地位的發展；與北京政府的不合作態度以及同英國和日本帝國勢力的靠攏有了強烈的對比。所以馬林結束了與中山先生的會談，便速返北京，針對此一中國情勢向當時蘇俄駐華人員[意開斯（Alexander Paikes）]舉行了匯報，並於會後提交了兩份有關於中國問題的初步報告，請其轉交莫斯科。（註二二）第一份報告書是向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介紹了有關中國國民黨以及共產黨的現況以及發展，第二份文件是給蘇俄外交事務委員會，向其建議委派一位蘇俄使者來到廣州。這說明了當時蘇俄以及第三國際對於中國政策的決策過程有很大的程度是受到當時駐華人員的影響。而彼此對於中國所處的反西方帝國的角色扮演，實有一定的共識。只是透過以外交為主或是支持中山先生的革命勢力，來成立一個親俄的中國政權，有不同的思維或手法，但其目標卻是一致的。

肆、策略的修正——由輕孫到聯盟，「孫越宣言」的形成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越宣言」的發佈，同年九月鮑羅廷（M. Borodin）進駐廣州的舉動，或多或少顯示了蘇聯以及第三國際對中山先生的重視程度，已經在馬林的相關建議中獲得提升。

一九二二年三月底，表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A. S. Dolin）正準備離開前往廣州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時，突然接到北京蘇維埃使團團長要其赴京的通知。爾後，巴意開斯向其轉達了

來自莫斯科的指示，要求其：(1)同孫中山建立直接的聯繫，了解他的國內外政策；(2)探索孫中山對蘇俄的態度和最近的計劃；(3)以及國民黨在廣州政府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並被授予以正式的全權代表身份同孫中山談判。(註二三)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達林在張太雷等人的陪同下抵達了廣州，四月三十日和孫中山首次會面。在會談中，中山先生要蘇俄協助中國大規模的建設鐵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並希望得到蘇俄專家來處理國家經濟，以及掃除國內軍閥建立全國統一的軍隊。(註二四)達林則批評了國民黨軍雇用制度的不可靠，國民黨的組織太渙散並不像一個政黨。從四月末到六月中，達林至少每週和孫會面二次，其間討論了中國共產黨作爲一個政黨的形式加入國民黨的相關議題。(註二五)達林認爲：「這樣加入國民黨就是反帝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具體形式」，但未獲中山先生同意。中山先生強調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必要性，並且說明了並非所有的國民黨員都贊同蘇俄。

但由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的成功，使中山先生再度退出廣州，由於此次的大挫敗，使其革命事業有了一次大轉變。在此一情境下，中山先生決定傾向蘇俄以獲取俄援。並認爲「蘇俄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也承認國民黨現在已「絕對需要」與克里姆林宮建立密切的關係。(註二六)根據韋慕庭教授(M. Wilbur)的研究：中山先生在廣州二度失敗後，一到上海便立即展開活動企圖收復自己南方的根據地；同時更將目標遠放於北京政府。爲了完成他的目標，中山先生便急於得到國外援助和國內的盟友，在蘇俄積極的運作下，其和蘇俄的聯盟正逐步的形成。(註二七)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蘇俄駐華代表越飛(A. A. Joffe)由北京派出其軍事隨員蓋格爾(A. L. Geker)來滬，詳詢中山先生軍事狀況並策劃合作方案的進行，此後幾個月中山先生同越飛進行書面溝通，並探尋雙方合作的基礎以及障礙之所在。(註二八)

此時北京政府和蘇俄的外交利益逐漸矛盾；越飛的北京任務失敗後，便轉往上海搖身一變成爲第三

國際和蘇俄的代理人，從一九二三年一月起，越飛和中山先生進行多次的協商。而馬林先前亦在上海同中山先生就中國共產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及與蘇俄的交往層級及屬性等許多爭議性議題上達成了初步的諒解。（註二九）中山先生因而接受了馬林提出國民黨改組等意見；隨後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員便在第三國際以及中共的默許下率先加入國民黨，不過他們仍然未放棄對中共中央以及布爾什維克黨的效忠，此時國共新關係，仍未達成具體內容。（註三〇）爾後，馬林來回奔走於北京和上海間，並在張繼的協助下策動越飛同孫中山談判聯盟的問題。終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雙方的「合理方案」透過宣言加以表達。「孫越宣言」鄭重聲明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均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最重要最要緊迫的問題乃在於中國的統一成功與國家完全獨立的獲得。並保證中國將得到俄國的援助以及全體國民的支持，越飛並重申以前的對華宣言的有效性。（註三一）但蘇聯的國內媒體在發布此一新聞的同時，卻把關於共產組織，蘇維埃制度不適合中國的字句加以刪除。（註三二）因為此種妥協的外交手法是無法獲得蘇聯人民的支持，雖然它們無礙蘇聯的國家利益。

此外，「孫越宣言」的妥協立場；對孫中山陣營而言只有象徵性意義。雖然以「俄羅斯人民」的名義，保證給予中國最熱切的「同情」和幫助，但對於雙方「政府」的實質交往以及來自蘇聯物質的支持承諾則未充分揭露。但這篇宣言的重要性在於把孫中山的思想與馬列主義的分野清楚地呈現出來，中山先生並沒有急需俄援而放棄他的領導權威和理論學說；而卑屈地和共產主義站在同一條戰線上。（註三三）此外，這個宣言亦滿足了孫中山在其主義信仰以及共產主義信條兩者矛盾性的有效控制能力和信念進而提升其黨內日漸低落的聲望，使其革命理想更趨實際。而第三國際和中共在獲得來自孫中山南方勢力的正面回應後，對於爭取中國知識階層以及廣大群眾的認同上有極大的裨益。當然，此舉亦對北京政府產生巨大的壓力；在中國政策的推動上，實得到更加靈活的運用空間。所以從第三國際代表「疏孫到聯孫」的決策過程得之；其考量因素絕非是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中所稱「以中國人民大眾利益為依

歸」，（註三四）而是反映在中國政策的許多衝突和利益上。其妥協的只是其外圍利益，其核心利益也就是扶植中國共產黨並促成國民黨向「左」轉的本質是不會動搖的。

伍、結論

早期，蘇俄和第三國際在中國籌建中國共產黨之際，亦積極和吳佩孚、陳炯明、孫中山等革命勢力建立聯繫，其目的乃在於成立一反帝的聯合戰線，其動機乃是當時中國無產階級勢力薄弱，中國共產黨又是一個「人爲的早產」，決無能力單獨完成中國的民族革命。

在交往的過程中，基於彼此有重疊的利益，故有提出要求的談判動力，談判陣營的參與者在視談判結果將非零和的認知情況下，由於(1)雙方交往歷史的缺乏；(2)國際反共環境的制約；(3)對於對方談判動機、態度與行爲的質疑上；(4)談判效果的期待；(5)談判條件的考量；(6)談判陣營手中籌碼的評估上，初期第三國際和蘇俄政府明顯受到「赤塔方針」的影響，而將吳佩孚、陳炯明等人的談判模式視爲整合型談判，誇大了議題的合作面，而忽略了其中的衝突面，反而將孫中山視爲不切實際的夢想家，這雖然和孫中山陣營所擁有的權力結構有關，但亦反映出第三國際和蘇俄的利益觀，以及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一面。

爾後，隨著中國談判環境的變遷：(1)吳、陳相繼與共產黨員交惡，向西方靠攏；(2)孫中山所代表的南方勢力，在中國政治圈內的「權力分量」已明顯提升，並且已在勞工、知識階層中塑造了領導權威；(3)與北京政府的外交談判，出現了嚴重的磨擦，彼此在外蒙古等地的談判議題，已無法獲得協商；(4)孫中山向西方傾斜，尤以美國爲主的外援政策，出現了危機。這使得第三國際有更多的臨界點可以和孫中山接觸、表達友善，更讓第三國際領導者瞭解到，孫中山絕對比吳、陳更具備攻擊資本主義的能力。

在此一談判條件的認知下，雖然有若干因素阻礙雙方建立深層談判之進行，譬如(1)國際視聽的壓

力；(2)雙方權力不均等；(3)彼此意識型態的差異；(4)國民黨內部的消極回應；(5)中國共產黨員的負面反應，但在第三國際靈活談判策略的運用下，除了探索雙方合作的基礎，製造更多的相互依賴關係之外，並透過「孫越宣言」以非常彈性的立場來展示其「友好」的一面，在充分利用友誼作出韁繩的策略下，有讓步（Concession-making）和欺詐（deceiving）等談判技術交叉運用，雖然其間的某些論點和其革命輸出的「原則」相抵觸，但卻無礙蘇聯的國家利益，其所退卻、妥協的只是外圍利益，其核心利益只不過是隱藏起來罷了。

註釋

註 一：Lyman P. Van Slyke, *Enemies and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7.

註 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輯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三一。

註 三：蔣永敬，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八十二年），頁七三——七四。

註 四：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七十六年），頁一〇九——一一〇。

註 五：列寧、史大林論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頁六。

註 六：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七年），頁二。

註 七：列寧、史大林論中國，頁七——一三。

註 八：郝盛湖主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四六六——四六七。

- 註九：Xenia Joukoff Eudin and Robert C. North, *Soviet Russia and East 1920-1927*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67.
- 註一〇：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二二一。
- 註一一：郭恆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78年），頁一八。
- 註一二：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六七二。
- 註一三：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頁六七三——六七四。
- 註一四：郭成堂，陳獨秀與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台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二年），頁一七。
- 註一五：張緒心等著，卜大中譯，孫中山未完成的革命（台北：時報出版社，1993年），頁一三〇。
- 註一六：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一一〇。
- 註一七：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頁一八。
- 註一八：羅家倫編著，國父年譜（增訂本）（台北：中國國民黨編纂委員會，民國五十八年），頁八五五。
- 註一九：蔣中正，蘇俄在中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民國四十五年），頁一六。
- 註二〇：陸建洪，『共產國際前期對中國資產階級特點的歷史考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期5（1992年），頁58。
- 註二一：陳福霖，孫中山、廖仲凱同中國革命（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九〇——九一。
- 註二二：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頁三七。
- 註二三：達林著，侯均初等譯，中國回憶錄（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六四——六五。

註二四：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頁二六四——二六五。